



日本軍政下的香港

小林英夫 柴田善雅 著

田泉 李璽 魏育芳 譯

日本軍政下的香港

小林英夫 柴田善雅 著

田泉 李璽 魏育芳 譯

商務印書館

Nihon Gunseika No HongKong by Hideo Kobayashi & Yoshimasa Shibata

Copyright ©1996 by Hideo Kobayashi & Yoshimasa Shibat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akaihyoronsha Co.,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Ltd.

This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akaihyoronsha Co., Ltd.,

Tokyo, through HonnoKizuna, Inc., Tokyo, and Sun Cultural Enterprises Ltd.

封面照片由高添強先生提供。

日本軍政下的香港

作者：小林英夫 柴田善雅

譯者：田泉 李璽 魏育芳

責任編輯：黃振威

封面設計：楊愛文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

版次：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16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5675 7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序一

關於日據香港的歷史研究，大多圍繞當時社會狀況作個案式描述，或集中討論當時市民苦難或特定人羣，例如戰俘、集中營的英籍和混血兒居民，以及遊擊隊或英軍方面的地下抵抗者等。華文著作討論這段時期時，通常引用時人回憶或報刊資料，直至近年才使用藏於英、日、美，以及香港等地的解密檔案史料。即使 1970 年代香港史家安德葛 (G. B. Endacott) 撰寫的《香港日蝕》(*Hong Kong Eclipse*)，亦主要參考英國和香港的相關資料，幾乎未有引用任何日本方面的檔案。日本防衛廳的官方戰史《香港・長沙作戰》雖然使用日本檔案，但研究範圍只限 1941 年 12 月 8 日到 25 日的香港戰役，而且描述重點亦只是日軍的作戰經過。因此，小林英夫與柴田善雅的《日本軍政下的香港》在 1996 年出版時，實在是開創了利用日本檔案資料研究戰時香港歷史政治與社會的先河。

《日本軍政下的香港》的第一作者小林英夫生於 1943 年，曾就學於東京都立大學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歷任東京駒澤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早稻田大學大學院亞細亞太平洋研究科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為近代亞洲史，尤以二十世紀日本的經濟史為主，除了本書外，他的其他著作包括《大東亞共榮圈的形成與崩壞》(1975 年)、《戰後日本資本主義與“東亞細亞經濟圈”》(1983 年)、《日本軍政下的亞細亞——“大東亞共榮圈”與軍票》(1993 年)、《滿鐵——“知之集團”的誕生與死亡》

(1996)，以及較近期的《帝國日本與總力戰體制——戰前・戰後之連續與亞細亞》(2004年)等。他早年的作品大多集中討論近代日本的宏觀經濟問題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其後則逐漸轉移至近代日本國家機構對國民經濟進行統合的嘗試，並提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即逐步加強政府對經濟的計劃和控制，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日本戰敗結束仍未有改變這個趨勢。他在研究滿洲國、香港，以及其他東南亞日本控制範圍的經濟史時，即注意到當時日本政府決策者均擁有強烈的計劃意識，並不斷嘗試統制經濟活動以增強國力或支撐日本的戰爭機器。第二作者柴田善雅為近代日本經濟史家，研究興趣主要為金融、貨幣，以及企業活動，着眼點為1930年代至1940年代。其主要著作包括《佔領地通貨金融政策的展開》(1999年)、《中國佔領地日系企業的活動》(2008年)，以及《戰時日本的金融統制——資金市場與會社經理》(2011年)等。

小林和柴田秉承日本近代經濟史學者的優良傳統，對數據搜集和統計均極為仔細，亦對諸如法令編寫、資金流動、經濟政策，以及物流活動等非常敏銳，而且兩人一個注重宏觀經濟與政策，一個注重金融與企業等問題，因此《日本軍政下的香港》一書對戰時香港經濟的描述極為詳細，甚具參考價值。撰寫拙著《重光之路》時，我亦曾不時參考此書，尤其是部分大藏省和防衛省的資料，後者包括日本軍政府首任參謀長矢崎堪十撰寫的〈香港統治方策私見〉等重要文件。他們亦是首批使用日據時期日文經濟刊物《香港東洋經濟新報》的學者，該刊詳細列出了日本對香港的經濟計劃，並有大量關於社會、經濟，以至文化生活的資料。可是，兩人主要使用當時已公開的資料而忽略日本軍政部門內部的數據，因此有時只能列出計劃數字而無法呈現實際情況。這個問題，需要利用日本陸軍以及諸如大東亞省等機關的檔案、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 的情報資料，以及藏於香港政府檔案處的總督部檔案才得以有所突破（詳見《重光之路》）。

由於小林和柴田撰寫此書時不少日文資料尚未普及，而且兩人均為經濟史學者，加上兩人少有使用中、英、美三國資料，因此《日本軍政下的香港》集中討論日據時期的社會和經濟面向，並且主要以日本官方（軍政府、總督部，以及東京政府的各部門）為視角。雖然兩人亦有著力描述日本的人口強遷、軍票，以及配給政策為香港社會帶來重大破壞，但兩人卻未有詳論各方在戰爭期間於香港進行的軍事活動、香港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戰略重要性，以及日、英、美、中（包括國民政府、汪精衛政權，以及中共）各勢力對香港的計劃以及行動。因此，戰爭成為經濟和社會變化的大背景，而非改變的原因之一。《日本軍政下的香港》亦缺少關於香港軍民地下抵抗及其戰略重要性的討論，因此未能把香港在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歷完整地（除了經濟部分外）放在亞洲以及世界歷史的脈絡之中。可是，本書依然為少數關於香港日軍時期的學術研究著作，而且兩位作者亦搜集了大量外國人難以獲得的重要檔案資料與數據，因此本書在香港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可置疑。筆者能獲商務印書館邀請為本書中文版作序，深感榮幸。

鄭智文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序二

十多年前，本人為了編寫一本有關 1941 至 1946 年間港人生活的書籍，曾翻閱不少當時的報章及雜誌，以為寫作材料。現在能先睹小林英夫和柴田善雅兩位先生的著作《日本軍政下的香港》，得以增加若干方面的知識。

書中着重描述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期間日軍當局的統治體制、人口疏散、軍票、“兩華會”和區政等各方面，亦重點談論當時滯港的中國要人，以及殖民地社會的華人精英。而書中第 I 部分的第 8 章，更介紹當時不少港人移居到被視為“世外桃源之中立地帶”的澳門。原來當時的澳門亦是物資轉運及走私的中心點。

書中提到日本當局刻意將香港經營為顛覆重慶政權，以及日本位於南方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基地。為達此目的，日軍在港推行各種殘暴和苛刻的措施。根據各種記載，當中包括人口疏散、戶口調查、物業登記等政策，以冀大幅度減少人口，同時用軍票掠奪港人的現金和資產。不少人於轉徙中喪失了財產以至生命。

此外，糧食、油、糖、鹽以至柴薪等皆嚴重短缺，市民需長時間輪候以待配給。到了後期，當日軍官員與財閥合組的“興發營團”成立後，更壟斷了米糧的經營和運輸。每斤米價由淪陷初期的軍票 20 錢（仙），暴升至 1945 年 8 月的 300 元（折合港幣 1,200 元）。不少人因此餓死，煮

食屍體事件亦時有發生。

除電車外，各種車輛，包括消防車和救護車等，大部分被運往日本。轎和人力車成為主要交通工具。另外水、電、煤及汽油嚴重短缺，供應不穩定，各種渡輪也因而停駛。

淪陷期間，教育幾乎完全停頓，只有四十多間學校獲准復課。至1945年中，島上中、小學生只有四千多名左右。

在醫療方面，為市民提供免費服務的主要是東華及廣華醫院，輔以由那打素醫院及國家醫院易名的兩所“市民醫院”。1945年中，東華三院總理為籌募經費沿門勸捐，又闢房舍收容街頭垂死者。香港此時的人口只剩下五十餘萬。

書內亦提到“兩華會”的成員於日軍投降後，在英國統治再次回歸下活動。前港府華民政務司那魯麟（Roland Arthur Charles North）指出，在淪陷初期，他與律政司和軍政司曾接觸羅旭龢（Robert Kotewall）及周壽臣，希望他們能忍辱負重，減少華人的痛苦，呼籲港人勿對之諸多留難。羅旭龢在1949年逝世，港督曾派麥道高（David Mercer MacDougall）等多名高級政府官員出席喪禮。

本人的雙親於淪陷時期一直在港生活，可以用“朝不保夕”來形容，後來更不時憶述當時的艱苦日子。十年前編寫《香江冷月》時，本人曾獲聖雅各福群會安排，訪問十多位經歷過日治時代的長者，獲得不少有用的資料。自拜讀《日本軍政下的香港》之後，認識就更深了。

商務印書館邀請本人寫序，愧不敢當，謹以此文，表達對當年歷史的關注。

鄭寶鴻謹識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前言

日本軍政期的香港研究課題

一、本書的課題

1941年12月8日的宣戰公告宣佈亞洲太平洋戰爭爆發。早在1937年，日本已經開始發動戰爭侵略中國，中國沿海主要城市被日軍佔領。除此以外，日軍佔領的地區還包括當時被稱為“蒙疆”的內蒙古和長江沿岸地區。太平洋戰爭爆發使被割讓的香港、天津和上海租界也遭日軍佔領，日軍當時在華侵佔了很多土地。

日本在各佔領地區均成立了親日政權。1937年12月日本在華北成立了臨時政府，1937年3月在華中成立了維新政府，在內蒙古則分別於1937年9月成立察南政府、10月成立晉北政府及蒙古聯盟政府後，於1939年9月設置了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此外，還讓國民黨的汪精衛逃出重慶，並於1940年9月在南京建立對抗蔣介石重慶政府的南京政府。在汪精衛建立政權的同時，日本解散了維新政府，把臨時政府改稱為華北政務委員會，而蒙疆的蒙古聯合政府則一直獨立於汪精衛政權。這些被佔領的地區都由日本陸軍進行軍事控制，只有海南島於1939年2月被日本海軍佔領。在海南島上雖然也出現過親日政權，但事實上實行的是近乎軍政的佔領政策，甚至否認汪精衛政權的貨幣發行權而繼續使用軍

票，直至日本戰敗為止。一旦把握這個脈絡，我們就可把日軍佔領香港視作亞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一種地域擴展舉動。

被日軍佔領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支援重慶政權的物資都經由香港通過粵漢鐵路運送回中國大陸，日軍在攻佔廣東的戰事中切斷了這條運輸線路。儘管如此，香港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作為未被佔領的自由區域，連同上海租界、天津租界一併成為對華支援的據點。不過，即使不經粵漢鐵路，大量物資也通過空運、海運、陸運等流入中國大陸。另外，由於香港設有法幣安定基金，因此香港在金融方面也是支援重慶政府的一個據點。所以對英宣戰的公告使香港成為日軍必須立即佔領的地區。而且，由於日軍已經遍佈廣東省並已掌握了中國沿海的制海權，因此從軍事戰略上來說，香港已經處於囊中之鼈的境地，日軍佔領香港的戰事最終以 12 月 25 日香港淪陷終結¹。

在亞洲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沒有表明要佔領的東亞地區，只有位於珠江三角洲西端、作為中立國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門。與同樣作為葡萄牙殖民地而受到日本軍事攻擊的東帝汶相比，日軍對待澳門的態度明顯不一樣。一般認為，其原因除了是兩者在地理位置上存在差異外，東帝汶被視為日本海軍長期佔領荷屬東印度，並有助日本轉攻澳洲的軍事基地。而對於澳門，日軍的着眼點是在攻佔和交換東帝汶時，澳門在物資調配等的作用，所以認為不佔領澳門才是上策。

香港地區包括鴉片戰爭後於 1842 年簽訂《南京條約》時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島，及 1860 年簽訂《天津條約》時割讓的九龍半島和其他諸島，以及之後 1898 年訂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給英國長達 99 年的新界

1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香港・長沙作戰》（朝雲新聞社，1971 年）。

等地。²

英國殖民地香港由廣東省南部，位於珠江三角洲東部的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以及新界構成。除此以外的諸島，包括大小僅次於香港島的大嶼山，並把涵蓋這些附屬島嶼的全部區域統稱為香港。雖然附屬島嶼的面積很大，但由於人口稀少、沒有甚麼重要產業，因此本書對這些附屬島嶼不作贅述。在涉及香港制度的記述中提及“香港”，偶爾也會被稱為“香港島”，這樣在表述上容易引起混亂，本書會儘量避免這種混亂。香港毗鄰廣東省，由香港政府管理的九廣鐵路與廣東省的廣九鐵路連結深圳，並築起了邊境線。因為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由殖民地政府管理，自然沒有議會也沒有義務教育。殖民地政府長期投資港口，使香港這個自由港在海運和商業中轉貿易方面十分發達。

日軍佔領香港後，第23軍在1941年12月29日設置軍政廳實施軍政。1942年1月20日設置香港總督部，取代軍政廳，繼續施行軍政統治。所謂軍政，是指在軍隊所佔領的地區組織軍政府，對該地區直接實行行政管理的制度。日本軍政統治制度，完全與日本在中國其他佔領區以親日政府、傀儡政府的名義進行的間接統治不同。日本在中國進行軍政統治的歷史，就是日軍在日俄戰爭後在滿洲進行的軍政統治。³日本施行軍政，由日軍參謀部建立軍政主管部門負責法令公佈實施、徵收税金及公用事業費用、管理公共事業、提供行政服務、舉行審判、進行物資調配以及港口建設等。軍政的經營管理在各軍政區域的軍政會計處進

2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G. B.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4; 小椋廣勝・《香港》(岩波書店, 1942年)。

3 例如大山梓,《日俄戰爭的軍政史錄》(芙蓉書房, 1973年)。關於軍政統治下的特定事業在特別會計處進行管理的事例,請參看柴田雅善,《南方軍事財政和通貨金融政策》,正田康行編,《“南方共榮圈”——戰時日本的東南亞經濟統治》(多賀出版, 1995年)。

行，但該軍政區域內的特定事業，如公共事業、糧食供應和配給、礦山開採，甚至鴉片製造銷售等個別事務，有時會由特別會計科進行區分管理。這些行政內容會因軍政區域的地域性特徵、經濟規模和實行軍政時間的長短，以及佔領區在軍事上的穩定性等因素，而產生巨大差異⁴。不僅在日俄戰爭，還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佔領的青島和膠州灣一帶實施的軍政、在荷屬南洋羣島上實施的海軍軍政⁵，以及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日軍佔領海南島後，事實上實施的均是近乎軍政的統治⁶。而且，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在英屬馬來亞、荷屬印度、緬甸、菲律賓的南方佔領區都施行了軍政統治⁷。

關於香港的軍政，正如在本書以後的章節所述，日本實施了大量的佔領政策，包括：疏散人口、建立軍票經濟、日本企業經營香港本土產業、引入糧食等的配給制度、統一管制百姓娛樂等，從多方面對香港百姓的生活加以粗暴的干涉。結果使百姓生活在物資不足和通貨膨脹的陰霾下，最終以日軍戰敗而結束了日本對香港的軍政統治。以香港軍政在制度各個方面具有的特徵，並從日本侵華軍票的流通來看，可以說與日軍在海南島實施的軍政統治十分相似；而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開始實施的軍政，所建立起類似體制的這點來看，則與日本在南方佔領地區的軍政統治接近。日本的軍政統治雖然很短暫，但為香港的經濟制度帶來了

4 關於軍政統治的概論，請參看岩武照彥，《南方軍政下的經濟政策（上）》（汲古書院，1980年）。

5 日本在德國的租界青島同樣實施過軍政統治，詳細內容請參看胡喬木等編，《帝國主義與青島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濟南）。日本海軍也曾佔領荷屬南洋羣島並在其上實施過軍政統治，詳細內容請參看 Mark Peattie, *Nan'y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in Micronesia, 1885-1945*,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6 關於日本在海南島的軍政統治，目前可參考的文獻有收錄在《“南方共榮圈”——戰時日本的東南亞經濟統治》中，小池聖一的《海軍在南方的“民政”》。

7 關於日本在南方佔領地區實施的軍政統治，請參考前述，《南方軍政下的經濟政策》、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爭史室編，《南方的軍政史料集》（朝雲新聞社，1990年），前述《“南方共榮圈”——戰時日本的東南亞經濟統治》等文獻。

重大打擊。日本戰敗後，香港再次回歸殖民地政府的統治。之後經過日軍被扣留或復員、沒收日本資產、歸還英國資產、廢棄軍票等一系列措施，日本軍政統治的痕跡便迅速灰飛煙滅。

談及對今日香港的印象，立刻令人聯想到高廈林立、與眾不同的城市。在鄰近香港市區的啟德機場降落後穿行於香港市內、澳門、廣東的日本觀光客，以及商務人士不在少數。作為進入香港的大門——啟德機場，飛機一開始要降落的機場跑道現在從九龍灣延伸而出，但在日軍佔領時期的機場，是將現在的跑道扭轉近 90 度的方向而設置於海上。在日軍佔領期間，舊大日本航空公司以及在日軍佔領期在華中成立的中華航空公司，開通了從香港機場飛往中國各地，以及往南方佔領地區和日軍干涉區域的定期航班⁸。香港作為貿易中轉港而變得繁榮。在日軍佔領初期，市內的商品存貨充足，據說當時在香港能夠用廉價購買到在日本價格不菲的威士忌⁹，這一點應該很像今天能夠以廉價買到奢侈品的免稅中心吧。

當今香港作為限制較少的自由貿易區域，充分地發揮了其獨特性，很多日本企業進出香港，在製造業、商業、金融業等廣泛領域開展自己的業務。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其經濟產業的繁盛讓我們驚歎。由於對貿易的限制較少，甚至可以看到香港國際金融的離岸市場逐漸凌駕日本。此外，香港作為對華投資的基地，獲得很多國家的關注和資金投入，而這些資金又被投放到中國大陸。香港資本對東南亞的資本出口已經達到相當大的規模，今天已經不可片面地把香港僅僅視作投資區域般看待。

8 東洋經濟新報社，《軍政下的香港》（東洋經濟新報社，1944年），129頁。

9 據說佔領初期在香港能夠低價買到在日本買不到的高級蘇格蘭威士忌。（渡邊武，〈香港出差報告〉（1942年，大藏省資料：Z530-145））。

根據 1984 年 12 月簽訂的《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將於 1997 年 7 月回歸中國。人們都屏息關注 97 年以後香港的前途。“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在現行中國政治體制下是否實際成立，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體制發展緊密相關，但看上去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體制存在過大的差異。因此，香港很多資本家都試圖通過取得加拿大等國的國籍來迴避風險。正因為存在這些潛在不穩定因素，所以 1997 年以後的香港備受關注。根據 1987 年 4 月簽訂的《中葡聯合聲明》，澳門也將於 1999 年 12 月從葡萄牙回歸到中國大陸，在澳門回歸上也存在着類似的問題。

日本這些對香港經濟的參與，雖然僅僅關注的是戰後貿易以及投資，或是購物觀光等方面，但是在半個多世紀以前，香港卻被日本佔領，處於日本的軍政統治之下，連街道等也被改為日本名稱，日本的企業也作為政府的授命企業進駐香港。但是在經歷戰後 50 年的今天，就連日本曾經佔領過香港這段歷史，都逐漸從日本人的記憶中消失。1995 年是戰後 50 年，也是值得紀念的一年，雖然勾起了諸多回憶，但是幾乎可以預想到這樣的浪潮會在 1996 年之後隨着時間逐漸減弱。50 年或許是又一個“新的遺忘”之開始。在經過戰後高度經濟增長而實現驟變的日本社會，幾乎沒有餘暇回顧歷史，又或是日本不拘泥於過去風土習慣的緣故，這樣的擔心很可能成為現實。我們認為經過了 50 年，人們能夠以更客觀的態度分析的時代已經來臨，在“新的遺忘”即將開始之際，我們嘗試盡最大努力對我們所關心的香港軍政統治進行深入介紹。我們在本書中的研究課題將會把以前很少提及的香港軍政統治，置於與其他日軍在華佔領區同等重要的視野，並將香港軍政與日本在南方的軍政統治地區一起進行考察，在考慮香港特殊地位的同時，試圖描繪香港日本軍政統治的特徵。

二、香港軍政史的研究現狀

在日本談及佔領期之香港的專著和論文數量頗少。與此相反，對於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給東亞帶來的影響、日本企業進駐或者與中國進行中轉貿易時香港發揮的功能，以及香港作為東亞自由化金融中心等問題的關注，可說尤為強烈。但是，雖說對戰前的關注頗少，但迄今為止已經有幾部關於香港軍政的著作公開發表。除了攻佔香港的戰事等軍事史研究外，還有幾部從政治史的觀點提到香港¹⁰。在經濟史方面，最為系統的香港軍政研究要數松本繁一的幾篇論文¹¹，其中介紹了一些值得探討的課題。除此之外，對香港軍政統治整體展開的研究數量很少。

涉及香港軍政經濟控制的專題研究，可以看到如關於香港日本企業管理的研究論文¹²。除此之外，很多研究論著大都已在香港通史概說中有所提及。另外，在軍票的外地貨幣制度史研究¹³、贖幣製造的相關研究¹⁴，以及香港開設店舖的企業創業史研究中¹⁵都有所涉及。特別是與香港有關的日本文獻目錄的編纂¹⁶，使我們就這些文獻對今後研究的促進作用有所期待。這個現狀雖然描述得過於簡潔，但對於香港軍政統治之概況¹⁷就略作了以上的介紹。

10 岡田晃，《香港》（岩波書店，1985年）、中島嶺雄，〈香港——其歷史和未來〉（14）《日本的香港攻略和軍政》（《世界週報》，1984年12月18日），以及收錄此文的中島嶺雄，《香港——發展中的都市國家》（時事通信社，1985年）。

11 松本繁一，〈日本軍政期的香港經濟〉（《亞洲經濟》第17卷第1、2號，1976年1、2月）。

12 太田弘毅，〈在日本軍政統治下進入香港的公司企業〉（《政治經濟史學》第250號，1987年2月）。

13 日本銀行調查局，《日本貨幣圖錄》，第10卷〈外地貨幣的發行〉（東洋經濟新報社，1974年）。

14 山本憲藏，《陸軍贖幣戰略》（德間書店，1984年）。

15 台灣銀行史編纂室，《台灣銀行史》（1964年），東京銀行，《橫濱正金銀行全史》，第5卷上（東洋經濟新報社，1983年）（此卷在此之前曾有部分內容省略後收錄於橫濱正金銀行“每半年的外匯和金融報告”（日本銀行調查局，《日本金融史資料》昭和篇第28卷，大藏省印刷局，1960年））。

16 關於香港的目錄文獻有可兒弘明編，〈關於香港的日語單行本目錄〉、《關於香港的日語雜誌報導目錄》。同一資料還收錄於可兒弘明編，《香港及香港問題的研究》（東方書店，1991年）。

17 和久田幸助，《日本佔領下香港是怎樣的》（岩波書店，1984年）。

在香港也曾出版過幾本在日本人統治下痛苦度日的香港人，和從日本老百姓角度撰寫的回憶錄，這些著作也可以作為參考¹⁸。這些回憶錄大都缺乏系統性，但是書中詳述在日本軍政統治下人們所受的非人待遇，都成為日本軍政統治下的罪行及其殘暴行為的確鑿證據。甚至還有一些從殘酷的日常生活視角重新審視遭受日本軍政統治體驗的研究¹⁹。

此外，在英文出版物方面，除了在敘述香港通史過程中肯定英國殖民統治的同時，又介紹部分日本軍政統治內容的著作外²⁰，還有一些從戰前統治香港的英國人視角，回顧日軍佔領後滯留香港的經歷的回憶錄，在這些書中往往強調日本軍政統治如何暴戾²¹。還有著述把香港軍政看作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佔領東南亞等地區的一環，而進行了政治史上的定位²²，或者把日本軍政統治的影響，放在香港社會制度的變遷中進行定位²³。另外，也有作為通貨金融制度史中的一個片段，來談及日本軍政的軍票制度的著述²⁴，甚至在龐大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的歷史中，也有提及

18 在可確認的範圍內，早期的唐海，《香港淪陷記——18天的戰爭》（新新出版社，1942年，上海），是由逃出香港的中國人整理而成。在戰後也出版了幾本回憶錄，例如葉德偉等編，《香港淪陷史》（廣角鏡出版，1982年），不平山人，《香港淪陷回憶錄》（香江出版，1971年），謝永光，《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明報出版社，1991年）。日本人編著的有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日軍佔領下的香港教會》（創文社，1970年）。

19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三聯書店（香港），1993年）（該書日譯《日本占領下的香港》林道生譯，御茶の水書房，1995年）。

20 G.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and G. B. Endacott and Alan Birch, *Hong Kong Eclips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1 Alan Birch and Martin Cole, *Captive Christmas: The Battle of Hong Kong, December 1941*, Hong Kong: Heineman Education Books Asia, 1978 and Alan Birch and Martin Cole, *Hong Kong Captive: The Occupation of Hong Kong 1941-1945*, Hong Kong: Heineman Books Asia 1982.

22 Oliver Linsay, *At the Going Down of the Su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1.

23 Henry J.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hange in Social Structure," C. Jarvie and J. Agassi, eds. *Hong Kong: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24 Frank H. King (景復朗), *The Monetary System of Hong Kong*, Hong Kong: Graphic Press, 1953.

香港的軍政²⁵。我們也發表過幾個相關論述。小林英夫曾多次整理與香港軍票在戰後處理的相關內容²⁶，而柴田善雅也曾對軍政統治時期的金融貨幣政策作過概括論述²⁷。

我們可以了解到，雖然已有上述關於香港軍政統治期的先行研究，但是當中還沒有涉及香港佔領區的政策及制度，乃至經濟控制的實況和百姓生活等從廣闊視域進行的考證。因此，本書將以軍政統治下的香港政治制度、人口政策、經濟政策、金融貨幣政策、企業政策、中國人自治的政治參與制度，乃至對百姓生活的影響作為研究課題，旨在多方面描繪日本的軍政統治。

我們在本書出版之前，以迄今發表過的論文為藍本，嘗試進行改寫及補充。書中我們嘗試對課題作更進一步的考察，第Ⅰ部是關於香港佔領前後到結束佔領時期的通史內容，第Ⅱ部是關於貨幣政策、金融政策、企業進駐和貿易、對百姓生活的影響等內容。這並不是說，在我們嘗試討論的範圍內能夠全方位描述軍政統治的全貌，由於篇幅有限，我們不得不限定論點。儘管這是我們的一次嘗試，但我們認為這將是戰後對香港軍政統治進行的最全面總結。

25 Frank H. King (ed),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vol.3, The Hongkong Bank Between the Wars and the Bank Interned, 1919-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6 小林英夫，〈香港——檢舉軍用鈔票〉（《世界》，第588號，1991年9月）、〈軍票的歷史〉（高木健一、小林英夫等編，〈香港軍票與戰後補償〉，明石書店，1993年）、〈沒有軍票的補償就沒有亞洲的友好〉（《經濟學人》，第71卷第38號，1993年9月7日）、〈太平洋戰爭下的香港〉（駒澤大學經濟學會，〈經濟學論集〉，第26卷第3號，1994年12月），這些文章基本全部收錄於前述，〈日本占領下の香港〉的內容簡介——〈太平洋戰爭下の香港〉中，〈日本軍政下の亞細亞〉（岩波書店，1993年）。

27 柴田善雅，〈有關日本軍政期香港的金融政策的開展〉（《日本殖民地研究》創刊號，1988年11月）。